

30年代的法國政情與第三共和之滅亡

王英男

緒 言

20年代的法國政情是在交織著，歐戰勝利一雪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失敗之恥的驕傲，與戰後重建陷於財政危機，對德求償的錯綜情緒下，導引著內閣的步調，直到20年代末期的潘卡黑（R.Poincarré）財經改革方案確立，才初步穩定了政情。不期，30年代突如其來的全球性經濟恐慌，反襲捲了才踏上復興之路的法國，在一片蕭條聲中，歷屆政府之困於財經危機者，實更甚於20年代。影響所及內政之紛擾亦因財政問題而與俱來，一時之間黨政流派紛起，政治理論百家爭鳴，要者莫過於右派之法國法西斯黨與左派諸黨之對立；右派憂於法國或將變成共產主義國家，而左派懼於法國將如德、意之法西斯黨派即得權秉矣，二者鬥之激、爭之烈且置國家民生於度外，為史所罕見。

再者，外交如內政之延伸，而此際德國出兵萊茵非軍事區、西班牙之內戰、德出兵捷克蘇台德區等，在在涉及法國重大利害關係之外交事件，亦皆在其內政不修，事權不一，內閣之不濟而屢自陷於迷途如斯。總其政情觀之，或論共和終亡固有其時空之因素，察其行之六十餘年的共和國進入廿世紀30年代之演化發展，與夫當代歐陸諸強合縱之背景，徒增其危機者當有一定之脈絡可尋。今試就30年代法國政情演繹之數大端以析論之：

一、經濟恐慌與政局机隉

就30年代初而言，在美英德等重要工業國相繼困於經濟危機之際，法國卻仍

得於1931年中前後維繫著潘卡黑繁榮(註1)。1931年九月廿一日英國宣佈放棄金本位，並使英鎊貶值40%，恰如突然之間經濟恐慌也降臨了法國，該一危機對法國之衝擊，絕不下於對美英諸國之影響。

概言之，經濟危機之所以及於法國遠遲於美英者，實肇因於法國工業化較諸當代工業國中仍屬落後的相對因素使然，它方面農業比重的提升，明顯地使法國在總體經濟力量上對外貿的依存度自然降低(註2)。前總理潘卡黑在戰後持續重建的大規模公共工程計劃，由政府吸收了相當數量的勞動人口，而他的法郎穩定政策，也在在保證了法國的經濟力量於一時(註3)。在這種樂觀的態勢下，其負面之效果卻也已隱伏其中矣，法國當代政府對經濟情況的錯誤研判，使潘卡黑的繼任者塔奇厄(André Tardieu)總理，甚且於1929年十一月七日提出了五年國民裝備更新計劃，總金額達五十億法郎之鉅，其人對國際局勢前景的認知可見一斑。

這次經濟危機對法國而言，如謂係百餘年來所遭受到最嚴重的財政兼內政困境實亦不為過。由於暮氣沈沈的第三共和議會議事效率在黨派互爭的情況下，幾無適時有關地條例通過，加以共和國政府更迭過於頻仍，尙未及以合理之策略去適應現況而內閣已去職矣，故是法國之經濟危機伴隨內政危機而曠日持久。各項改革方案又往往受制於時局的牽葛而未得施行，就以金本位改制而言，英美先後於1931年及1933年宣佈放棄金本位(如前述)，並貶值其貨幣以增強國際貿易競爭力，法國卻腳踏不前，緊守金本位制不敢貿然使法郎浮動。蓋1928年潘卡黑內閣的經濟改革案，已使法郎幣值與公債利息損失了五分之四的面值(註5)，民怨甚深。需得維持1928年法郎的金本位水準已是政府保護信譽不可辭謝的任務。直

註 1. G. Duly, *Histoire de la France*, Larousse, Paris, 1970, P. 529. ci-apres designe, G. Duly, *Histoire de la France*.

註 2. Pierre Miquel, *Histoire de la France*, Fayard, Paris, 1976, PP. 514~515. Ci-apres designe, P. Miquel, *Histoire de la France*.

註 3. Jacques Becker, Serge Berstein, *Victoire et Frustrations 1914~1929*, Seuil, Paris, 1987, PP. 320~322.

註 4. op. cit., G. Duly, *Histoire de la France*, P. 530.

註 5. Ibid, P. 526.

到1936年內閣在絕大的壓力作成的法郎貶值決議，實已無法挽回施政之頹勢矣。

就政局言，1929年底潘卡黑以年老歸鄉，由塔奇厄組閣。塔奇厄被公認為克里孟梭（Clemenceau）的理想繼承人，然塔氏驕縱自恃總不憚於他人之進言，而欲引美國之政濟制度模式來改造法國，其結果可知終被迫離職(註6)。1931年1月27日改由其內閣部長之一的拉瓦（Pierre Laval）掌政。拉瓦首次入閣是在1917年克里孟梭當政時，以一個社會黨中間派人物，擔任一副部長級的職務，在1920年社會黨分裂後他變成了右派支持者。1925年在潘勒維（Paul Painlevé）內閣擔任公共工程部長，亦曾在邇後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的三屆內閣及塔奇厄內閣人任職，1931年初任閣揆。（連續在三屆保守右派政府任總理）一直到1932年二月御職再由塔奇厄組閣止(註7)。

1932年五月法國舉行大選，1924年“左翼聯盟”的組合使左派各黨贏得並掌握了年餘之政權，此際，激進社會黨及社會黨等又組成了左翼政黨，共同出擊，利用經濟危機高唱縮減軍費、確立勞工保險制、減稅及要求鐵路、部分軍事工業國有化等連串口號。結果，在人民普遍冀求早日脫離經濟危機繁絆的心理下，獲得多數支持，再一次使左派人士奪取了政權。

同年六月三日，新任總統樂布罕（Albert Lebrun）任命激進社會黨領袖艾奇歐（Edouard Herriot）組成左派政府，惟在大選中獲得最高票的法國社會黨（眾議院中佔一百卅一席），卻拒絕加入左派聯合政府。緣於社會黨領袖布魯（Leon Blum）一直不願認同由「資產階級」轉變的激進社會黨(註8)。布魯也深懼如若加入艾奇歐內閣，將使社會黨內那些黨性較薄的黨員轉而投靠共產黨，在

註 6. Dominique Borne, Henri Dubief, *La Crise des années 30 (1929-1938)*, Seuil, Paris, 1988, pp. 75~76. Ci-après désigné, *La Crise des Années 30 (1929-1938)*.

註 7. *Ibid.*, pp. 76~77.

註 8. 所謂激進社會黨其實它根本就不是激進的，亦非社會主義者，法國史家形容它們為「並非一個政黨，而是一種精神狀態」。它比任何政治團體在政治上更能代表資金雄厚的中間路線的資產階級與富有農民。譯自：(Voir, William L. Shirer,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69, p. 98.) Ci-après désigné.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這種矛盾的情緒中，社會黨與同屬左派的激進社會黨政府間，隱然產生了一股“左派政策”責任歸屬的衝突(註9)。終至社會黨轉而與右派結合，且於1932年十二月中推翻了艾奇歐政府。

一個多月之後，社會黨再與保守右派攜手，否決了由參議員朋庫(Paul Boncour)所領導之內閣。朋庫以獨立社會黨人士組閣，為了解決財政預算的一百一十億元赤字，朋庫以削減政府開支和增加直接稅來求取平衡。但在保守右派人士反對擴增直接稅，左派社會黨抗議政府部門開支削減的劣勢下，1933年元月廿八日，眾議院以300：193票決定了朋庫的前途(註10)。二月初才再度由激進社會黨人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成立新政府，他的內閣維持了近九個月之久。

達拉第出任艱鉅，各方咸認共和國所覓得人，他廉潔自持、明智、能斷早為各方所矚目。他在里昂大學讀書時受業於前總理艾可歐氏，故在政壇上劃屬艾奇歐一系，唯在激進社會黨中他又別於艾氏，獨權一格。1924年他四十歲首度入閣，迄1933年時他已在前後七屆內閣中擔任過部長職務，成了一位洗鍊的政治家。他週旋於參眾兩院及各黨派間，縱橫捭闔頗有一番作為。1933年十月底卻在一項非屬重大議事的削減政府員工薪俸的議案問題上，遭到了嚴重的挫折，維持了近九個月的內閣，雖較諸其它內閣之任期已長達三倍餘，卻仍以失敗收場。

接替他職務的亦為激進黨人沙賀(Albert Sarraut)，在位僅月餘即遭撤換。閣揆由同黨勻當(Camille Chautemps)繼之。勻當也只在位二月餘，且不得議會信任案之表決人已先行去職矣。在兩年不到的時間裡，竟先後有六屆激進黨內閣廣續輪替(註11)，使法國人民憂懼於他們的政府與國會，是否已失去了治理國家的能力？

政府更迭頗仍，議會效率不彰又未正視經濟危機問題的解決，人們愈來愈不能容忍政府與議會的作為，右翼黨派、部分退伍軍人團體及中資產階級的不滿，

註 9. Ibid, P.194.

註 10. Ibid, P.195.

註 11. op, cit, La Crise des années 30 (1929~1938) PP.79~80.

表現的更特別明顯，為維護一己之權益，乃紛紛投向法西斯的反議會、反共和宣傳之中，欲以獨斷的行動，橫掃議會民主，重振政府之威信來解決問題脫離困境，法國的法西斯乃形蓬勃。(註12)

二、法西斯主義興起與左派之「人民陣線」

(Front Populaire)

在上一世紀末，第三共和之共和黨溫和派政權過渡到共和黨極端派掌政的該段時日，共和黨控制的政府傾力排擠教權派與保皇派在參眾兩院的殘存勢力，並以世俗教育政策剝奪了千百年來教會對教育的控制權(註13)。保皇派與教權派的垂死掙扎因有所謂「法蘭西行動」(Ligue d'action Française)組織之刊物出版號召團結抗拒之心聲。迄本世紀30年代，該組織已逐漸演化為類似德、意之法西斯團體。1933初希特勒在德國得勢，更助長了法國法西斯黨人之氣焰，並出現了近乎軍事行動一般的結合，專以暗殺、破壞左翼黨政要人與集會之手段，來擴大其影響力。

反共和反議會民主的口號一再混淆著社會的視聽，尤其在巴黎，這處歷次爆發革命行動的根源地，1934年初當斯塔維斯基(Serge Stavisky)騙局醜聞被揭露後，群情譁然，一月十日隨即有首次反議會的法西斯示威，高呼“打倒強盜”(註14)。總理勻當低估了群眾對政治敗壞現象所感到憤怒的真切程度，並未認真地去徹查斯塔維斯基的劣行，國會中又有社會黨人一反素來對激進社會黨人的杯葛態度，在深恐法西斯得勢的陰影下，投票支持勻當，益使其輕忽潛存之危機。當一月下旬示威規模日趨擴大，情勢一發不可收拾之際，雖仍有參眾兩院對勻當的

註 12. D. W. Broga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rance (1870~1939)* Hamish Hamilton, London, PP.667~668. Ci-après désigné,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rance*.

註 13. Jean-Marie, Mayeu, *Les débuts de la IIIe République 1871~1898*, Seuil, Paris, 1987, PP.112~119.

註 14. op.cit,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P.209.

一體聲援，一月廿九日上任不及二月的勻當總理只得悵然而去。三個月前掛冠的達拉第奉召再作馮婦。

達拉第以撤換與醜聞案有諸多糾葛的相關警政官員，暫時平息了風波，但右派輿論已發出為法國覓取如同德、意等國領袖與制度之呼聲(註15)。黨派對立益熾，第三共和政體面臨了空前的挑戰。

溯其源共和國的金錢醜聞案非止此一端，在上一世紀末的勳章醜聞案(Scandale des décorations)，巴拿馬投資運河醜聞案(Scandale de la Cie Panama)，牽連之政府官員與議員人數極夥。一次戰後，共和國的金錢詐騙醜聞也一再重演，這一連串醜聞之累積，使民眾對共和國政治運作之反感實已達到不堪的地步。迄1934年，在法西斯黨人的煽動，和德、意政府勵精圖治的國情比較下，斯塔維斯基醜聞終於使反對共和國的情緒升高到了極至。

達拉第雖曰撤換相關高級官員，卻也在現實的壓力下不得已把被撤換卸任的巴黎市警察局長西亞普(Jean Chiappe)升任為駐摩洛哥總督(西亞普斷然拒絕)(註16)，此舉在複雜的巴黎政界，掀起了喧然大波。人們聽到西亞普高昇的消息，議論紛紛，各類揣測不遑而走。右派法西斯黨人，立時掌握契機而引西亞普事件作為攻擊政府的新題材，甚且把斯塔維斯基事件擱在一旁，竟成了「西亞普事件」，局勢一夕數變益增紛擾。

二日五日，法西斯黨派報紙刊登籲請各派成員及同情者響應在第二天走上街頭抗爭的啓事。隔日，二月六日達拉第見機要求國會對政府處置不為國人諒解一節，舉行信任投票，法西斯黨人糾眾四萬餘，向國會前進逼迫政府辭職。下午三時，國會在激烈爭吵後對達拉第政府一連進行了三次信任投票，結果以343：237票通過信任案。其過程，其票決實包含了幾許無奈，誠如社會黨領袖布魯所言者“吾人投票支持政府，並非信任政府而係在戰鬥中”(註17)。時守衛國會防止暴徒進佔會場的警察業已鳴槍，嚴重的衝突使在國會大廈開會諸議員皆了然於心

註 15. Ibid, PP.212~213.

註 16. Ibid, PP.210~211.

註 17. Ibid, P.216.

矣。

達拉第總理向總統匯報了暴動狀況，即轉往內閣尋求支持與解決之道。多數年輕閣員均主張以嚴厲手段懲治暴徒，用戒嚴、拘捕、控告等方式對肇事份子逕予處分。但以薄弱之警力，來抵擋一波波衝向國會的暴動群眾與法西斯武裝分子，也實不堪負荷。內閣建議立即調派部隊護衛京畿，惟達拉第總理在最後關頭仍未同意此舉，蓋陸軍部長魏剛（Maxime Weygand）係一著名的保皇派分子，與右派法西斯黨人的曖昧關係，是達拉第最大之顧慮（註18）。

消息再傳謂第二日（二月七日）將有更大規模的示威抗議行動。值此，在閣議中堅定支持達拉第的閣員紛紛改持保留態度，最終共和國總統樂布倫也暗示總理去職，以避免內戰。二月七日下午，達拉第以事不可為而去。前總統七十一歲的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在各方勸進下出面組閣。他把幾位著名的軍中元帥和七位前總理都納為閣員，集合了各派力量安撫政情，一星期後平息了暴動（註19）。

法國的法西斯黨人雖未能如德意之黨眾一舉取得政權，然此一史稱「2.6暴動」事件亦具極深之影響；暴動致使左右兩派短兵相接，首要者，法西斯右派黨人雖未能捲起震撼性之風潮，亦加其支持者以莫大之鼓舞。法西斯各黨派間始行其強有力之吸收黨員政策，適齡者如在一次大戰時無法參戰之年青國民，至此大批投靠業已質變之所謂右派退伍軍人團體的法西斯核心。1936年初估同情及加入法西斯為黨眾者已高達二百萬人以上，成了法國境內最重要之派系力量（註20），也成了顛覆第三共和的致命傷。

及論左派人士，法西斯右派的舉措使其人警覺性地產生共同危機感，緣於此，左派各組織乃在1934～1936年間盡力捐棄成見與互爭，在共產黨人態度幡然改變下，再度凝聚成一股左派政治勢力號稱「人民陣線」（註21）。

註 18. *ibid.*, pp. 220~221.

註 19. *op, cit.*, *La Crise des années 30 (1929~1938)* pp. 112~113.

註 20. *op, cit.*, G. Duly, *Histoire de la France*, P541.

註 21. *op, cit.*, *La Crise des années 30 (1929~1938)* P. 113.

三、「人民陣線」主政

早在1920年，法國社會黨即已分裂，多數黨員以激進之共產黨人自居，紛紛加入了列寧的第三國際，社會黨的保守分子在布魯的領導下繼續效忠於屬舊社會黨的 second 國際，此後二者分道揚鑣，在左派陣營中形成了對峙的局面(註22)。就在「2.6暴動」後，二月九日共產黨人即在協合廣場單獨舉行了一場反法西斯大遊行。二月十日社會黨人也以其所掌握之法國總工會(C.G.T)策劃下，進行了廿四小時罷工，以呼應「支持共和國反法西斯主義」。社會黨的行事遭到共產黨之嚴厲譴責。

不意，同年六月共產黨在接到第三國際蘇聯「祖國」的指示後，一改舊有政治路線，進而要求與社會黨合作共同反法西斯。實則，五月底莫斯科真理報的一篇社論，是促成法國左派合作的肇端。蓋史大林深恐法西斯在法國得勢而危害到蘇聯與共產世界的整體利益，才不惜指使法國共產黨暫停其鬥爭路線，而與社會黨攜手共渡難關(註23)。及此，共產黨又建議邀請其一向反對最力的激進社會黨入夥，以擴大左派陣營，共產黨亦且公開宣佈支持原本再三反對的軍備重整與兵役政策，是即在消弭激進社會黨與其它諸小黨對共產黨先前之疑懼—令其人不再擔心共產黨會在第三國際指揮下，萬一於德法開戰時有破壞國家的行動。激進黨領袖達拉第不顧艾奇歐等的強烈意向，投向了「左派」陣營。值是，水到渠成，三大黨在1935年七月十四日成立了「人民聯盟委員會」。

七月廿七日三派領袖在巴黎起草發表了共同宣言；以反法西斯黨派組織，要求立刻解散議會，比例代表制選舉國會議員、廢除政府緊縮通貨法令等政策為訴求，為下屆國會選舉作造勢準備(註24)。

「2.6暴動」後組閣的杜梅格，實際上所領導的是一個聯合內閣，上任後他

註 22. Paul Brunet, *Histoire du P.C.F. que Sais-Je?* P.U.F. paris, 1982, PP.52 ~53.

註 23. op.cit,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P.233.

註 24. op.cit, *La Crise des années 30 (1929~1938)*, PP.136~137.

未將注意力集中於立時解決棘手的政治問題，如憲法之修正「賦予共和國總統更廣泛的權力，得不經參議院同意即可逕自解散眾議院」，以平衡第三共和憲政體制長久以來令府院權力失調的局面(註25)。因於暴動後，參眾兩院議員人人自危的絕佳情勢下，修憲之舉當有十足的把握，惜年邁的前總統而新總理，一心思掛欲解決的是早成沈疴的財經危機。待經改不成再回首提出修憲計劃時，先機已失，在議會重重反對聲中，杜梅格於1934年十一月九日黯然告老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註26)。

繼之者，踵續有溫和保守派人士的弗隆丹(Etienne Flandin)與前總理拉瓦，也僅能維持聯合內閣的形式而不足以開創新局，在1936年春天的全國選舉已迫在眉睫，左派的整合又大功告成的情勢下，選戰未啓而勝負已見，「人民陣線」脫穎而出是可立而待也。

1936年元月加入人民聯盟的九十八個左派組織，共同通過了「人民陣線綱領」，其主要內容為；解散各類法西斯黨派，行政治大赦，消滅失業與農經危機，改組銀行，行軍事工業國有化，並以法蘇友好為基礎建立歐陸集體安全等。此綱領充分顧及了城市中產階層與工人、鄉村農民的各方需求。四月廿六日—五月三日的國會改選，「人民陣線」各派在眾議院得以376席：238席的懸殊差距贏得勝利(註27)，社會黨更以一百四十七席之多成了最大政黨。

六月四日共和國總統樂布倫，任命「人民陣線」主要締造者社會黨領袖布魯為總理。在此之前，從「人民陣線」在大選中獲勝的五月三日迄其正式執政之六月四日的一個月內，法國國內經濟發生了急遽變化。選舉前，右派各黨向選民提出了一致呼籲，警告謂「人民陣線」一旦主政法國即將走向共產主義。選舉結果使法國上層人士對「人民陣線」的終將組閣表現出無比的驚慌，甚且不以「改革」者看待左派勢力，一律以「革命」視之。巴黎證券交易所一夕暴跌，政府公債信

註 25. Les 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 GF-Flammarion, Paris, 1979, P P. 332~334.

註 26. op, ci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rance, (1870~1939), PP. 661~662.

註 27. op, cit, La Crise des années 30 (1929~1938) PP. 140~141.

用頓失，大筆資金匯往外國，黃金亦成搶手保值貨，選後不及一星期法蘭西銀行黃金儲備減少達卅五億法郎之鉅。(註28)

布魯在整個五月等待就任期間，一再高聲疾呼安撫資金持有者的情緒，但掌握大部分財富的上層階級仍不斷地把錢移往它處。最不堪者是乃，「人民陣線」一向標榜重視中下階層特別是工人的利益，它的選勝確使工人欣喜若狂，卻再也等不及左派的正式執政，就在未經他們所屬工會的許可下，展開了自發性規模空前地罷工活動。罷工愈演愈烈，罷工工人不再以靜坐為抗爭手段，採用佔領方式來遂其目的，對資方的產權漠視與強取是最令右派保守分子所深惡痛絕者，即將卸任的沙賀政府放任情勢惡化，迄六月三日布魯接受提名組閣時巴黎他區罷工人數已達卅五萬之眾，對「人民陣線」政府形成極大之諷刺與施政之困擾(註29)。

罷工運動直接影響的是共產黨人，時親共產黨人工會素來反對直接參與政治活動，在此境況下當六月四日布魯組閣時，共產黨以協調不足為由拒絕加入由它為發起者之一的「人民陣線」政府。布魯僅得成立了一個由社會黨與激進社會黨為主體的內閣。另樂布倫總統對布魯的任命雖是依法行事，然其人卻憂心於「人民陣線」很可能會毀滅整個法國，這種態度使他對新總理提出了極為嚴苛地要求，在國會尚未正式投票行使布魯同意組閣權時，即要求布魯立刻向工人表白新國會、新政府未來施政將對工人權益所行的保障，遂行工人所提出的立法議案，以促使工人停止罷工。布魯政府在這種氣氛下於六月六日在議會以384：211票獲得確認(註30)，而他的政府所將面臨的難題已一波波地來襲了。

在國內，罷工風潮並未因著布魯正式就任前後的廣播、保證而稍歇，反之愈形極端。資金外逃的現象在政局動盪的因素刺激下幾已動搖了國家財政根基。在國外，布魯就職前五個月，希特勒出兵萊茵區的的震撼，前政府的軟弱回應使獨裁者更大膽地投入了軍備重整。而意大利墨索里尼的併吞衣索匹亞，西班牙內戰的一觸即發，再再考驗著布魯的「人民陣線」政府。布魯衡量時局決定先行解決

註 28. op, cit,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P. 286.

註 29. op, cit, *La Crise des années 30 (1929~1938)*, pp. 151~152.

註 30. op, cit, G, Duly, *Histoire de la France*, P. 540.

國內困頓的經濟與罷工問題，再兼顧國際政局對法國之衝擊。

因之，他上任第二天的六月七日，即親自召集罷工工會勞資雙方代表在巴黎馬蒂留飯店（Hotel Matignon）舉行協商會議。當下作成決議；由新政府保證議會將很快地通過每週四十小時工時，每年有二週帶薪休假（Congé Payé）的立法法案。另由資方許諾增加百分之十五的工資，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談判權的讓步下，工會決定停止月餘來的罷工（註31）。但在法國當時尚未稱健全的各類工會組織，於工人並未有絕對地約束力，罷工風潮的止息費了相當時日與週折。在國會立法未完成前的六月十一日達到了罷工的最高潮，巴黎各行業都投入了罷工行列。同一天，眾議院以528：7票迅速通過了工會有權代表工人談判及每年二週帶薪休假的立法，六月十二日通過了每週四十小時工時的立法。六月十七、十八日參議院也以壓倒性多數票決，認可上述三項法案完成了立法程序（註32）。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懸宕未決的社會立法法案竟在這種急迫的情形下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草率的舉事已埋下了法案施行的不確定的因子。

四、西班牙內戰與「人民陣線」之瓦解

布魯竭力排解了國內的罷工風潮，並不意味著一切問題均已獲得完美之處理，暫為擱置的外交問題旋又踵至，處此布魯已感心餘力絀，乃至左派政府內起蕭牆之爭終於垮台。因素雖雜，在西班牙內戰問題上的未能圓融解紛，使布魯內閣意見相左產生顯見的分裂，是為主要導火線。

布魯上任不及二月的七月十八日，法國西南緊鄰西班牙爆發內戰。西國在1931年的一場不流血革命後，以「革命民主」政府取代了行之千年的帝制，迄1936年正由一類似法國「人民陣線」的黨派組織領導政府。他們同樣受到西班牙國內那股始終擁護君主制度的保守勢力之嫌惡，尤其那般軍事將領們。為了根除這

註 31. op. cit, La Crise des années 30. (1929~1938) PP. 153~154.

註 32. Ibid, p. 154.

些來自社會深層的威脅，西國當政的人民陣線政府或以逼迫退休，或以發給終身年俸的手段來遂其目的。時任西班牙軍隊參謀總長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將軍，亦遭解除現職。1936年七月十七日佛朗哥將軍飛往北非西國屬地摩洛哥發動政變，翌日在西國境內受到普遍響應，內戰乃興(註33)。

布魯政府與西班牙政府有著相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改革目標，而往來頻仍。事起布魯立時決定盡一切可能輸送武器援助，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合法政府」。但在國內右派要人紛紛表態對西國「叛亂」分子寄以同情之時，內閣決定武器運送以秘密方式進行(註34)。法國國防部部分支持右派的人士將此秘密洩露，七月廿三日巴黎回聲報（Echos）披露此一消息後，政界大譁。就在當日（七月廿三日）前往倫敦討論洛加諾公約遭德國破壞後，為歐洲均勢問題欲與英政府商議的布魯，受到英國保守黨政府對法國秘密援助西國一事以嚴肅的「忠告」。謂法國的舉動當引誘德、意二國對佛朗哥的軍援及不可知的衝突，歐陸和平當遭破壞是(註35)。

布魯雖未在意英國慎重的態度與警告，七月廿四日他返回巴黎後卻發現原先支持他軍援西國的部分內閣激進社會黨成員，如陸軍部長達拉第等人，在受到輿論民情的左右下，也擔心援助馬德里會給法國帶來戰禍而緘口。七月廿五日的閣議，在激進社會黨人的說服和輿論“不可干涉別國內政”的呼籲下，布魯決定法國政府將「暫停」向西班牙共和國運送武器(註36)。（他私下以墨西哥轉運方式將少量武器援西）

佛朗哥將軍在受到德意二國不公開地秘密軍援下，已漸掌握局勢，英國也頻頻對“叛軍”部隊作出正面和肯定的評價，法國政府在堅持不干涉的閣議下，已使其在西班牙問題上陷於孤立。西班牙內戰對法國的衝擊不僅在外交上受到挫折，尤其內政上，左派人士對西國政府的失敗深為痛心疾首，進而加怨於布魯的「人

註 33. op, cit, P. Miquel, Histoire de la France, PP. 526~527.

註 34. op, cit,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P. 298.

註 35. Ibid, P. 299.

註 36. Ibid, P. 300.

民陣線」政府，左派聯合內閣的團結遭到嚴重削弱，從而加速了它的崩解(註37)。

內政外交的互動，黨眾意見的相左，一再凸顯了布魯主政的混亂程序和決策。社會改革與財經健全是一體之兩面，布魯政府不察乎此，在法國承受了近五年的經濟危機，財政體質羸弱亟待調養生息的情況下，爲了平撫罷工風潮遽然推行的多項社會改革法案，顯然已超出了政府的能力範圍。多數民間資本家對工時縮短深不以爲然，而工資調整百分之十五的比例，更予經營陷入困境的公司以沉重壓力。資金外流是不爭的事實，那些未將資產匯往國外的資本家，對國內的投資環境亦多持保留遲疑的態度(註38)。布魯未諳全盤，竟又在七月廿一日國會通過了一項限期三年，總金額達二百億法郎的大工程計劃案，目標旨在吸收閒置勞動力，減少失業人口，及由此計劃款項之部分，援助那些殘喘掙扎求生的小型企業(註39)，此事無疑畫餅。

另受西班牙戰爭，德意擴軍的影響，九月七日布魯又決定發行一筆一百四十億元的公債，作爲重整軍備之用。此消息即刻引起了金融界大恐慌，進一步加速了資金外流。九月下旬法蘭西銀行公告謂已喪失了一百六十億法郎等值的黃金儲存，使國家銀行的黃金儲備降爲區區五百億法郎，是維持經濟正常運作的底限。九月廿六日布魯政府終於作成了法郎貶值與其政綱相背的決定(註40)。前年1928年潘卡黑法郎貶值五分之四的民怨，使布魯投鼠忌器，此時爲了解決財政困境在別無良方的現實環境下，不得不然耳。初始確也曾刺激了經濟的部分景氣，隨著投機分子競相拋售法郎，搶購外匯與黃金的演繹下，構成法郎幣值不穩的心理性通貨膨脹，民生物價節節攀升，低層階段的工人和下層政府雇員頓感生活失據，而交相指責要求提高工資以應付生計，罷工、怠工一再發生。這種惡性循環使布魯在灰心之餘，決定「暫停」有關「人民陣線」高唱的某些社會改革方案，削減必要開支，因應政府部門日增的財政赤字(註41)。共產黨與部分左派政黨對「暫

註 37. Ibid, P.302.

註 38. op,cit, La crise des années 30, (1929~1938), pp.154~155.

註 39. Ibid, pp.156~157.

註 40. Ibid, pp.160~162.

註 41. Ibid, pp.163~165.

停」的決定深不以爲然，他們一致認爲布魯政府背叛了左派聯合政綱，是一種失敗的訊息。

經濟危機的深化，國庫的空虛，法郎繼續外流，到了1937年年中法國工業產值已有嚴重下滑的趨勢，也使布魯意識到他堅持的"自由經濟"信念受到了嚴酷考驗的興廢絕續之關鍵時刻。六月十五日他召開了內閣緊急會議，正式宣佈對那些造成法郎外流及幣值危機的分子施以強硬制裁，用一切必要手段解決財經困難。眾議院以346：247票通過布魯的提案，未料，參議院在加入「人民陣線」政府之激進社會黨人會同杯葛的陣營下，於六月廿日否決了此財政整頓法案(註42)。究竟布魯應遵守眾議院或參議院的決議？是乃嚴重的憲政問題，在20年代法國內閣之更迭即往往因於兩院意見之相左，此係第三共和憲法立意不明之處。布魯仍於六月廿二日向共和國總統遞送辭呈，「人民陣線」聯盟名存實亡。

布魯推薦原內閣副總理，激進社會黨人勻當組閣，布魯本人轉任爲副總理，其它閣員亦多數留任，是爲「人民陣線」政府之新組合。勻當在1933年底即曾擔任短期總理職務，此時再度掌政態度益趨保守。盱衡情勢他以蕭曹之隨，賡續布魯的社會改革「暫停」措施及法郎浮動來刺激景氣，穩定大局。在共產黨與其支持者的中下層民眾，跋求新人新政的高度期盼至此破滅，憤懣情緒再度迷漫，罷工風潮又興。十二月底，巴黎公共事業部門，煤氣、電力、交通各業行總罷工，幾陷首都於癱瘓。1938年元月中旬，勻當以不妥協的高姿態應付罷工，社會黨人認爲已無續留府中之必要，全體退出了由激進社會黨所領導的內閣，元月十五日勻當宣佈辭職。元月十八日在政局混亂中再度由勻當擔綱，直到內政、外交一再受挫方於三月十日下午下台(註44)。

同年三月十三日，布魯組成第二屆「人民陣線」政府，他所面臨的棘手問題卻仍是財政困局。四月一日布魯要求國會授予主導財經政策之全權，他的方案是自1928年潘卡黑財政改革以來，所進行之一次最大膽的財政復興計劃。欲將大筆

註 42. Ibid, PP.183~184.

註 43. Jean Mathieux, Histoire de France, Hachette, Paris, 1981, P.88

註 44. op,ci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rance (1870~1939) PP.720~722.

資金投注於生產事業項目，大量增加信用貸款，管制外匯以導正金融混亂之走向。議會中右派議員對布魯案的爭議性看法，使政情幾度沸騰。四月六日當眾議院開始進入議程審議時，雖然右派議員也承認此案是有連貫性和建設性的，但對就中之外匯管制又頗不以為意，雖然他們也體察到資金外流所造成共和國的巨大傷害。在這般模糊的爭論中，眾議院以311：250票通過議案。參議院卻又在四月八日以214：47票推翻了眾議院的決議，布魯宣佈辭職(註45)，「人民陣線」組合再衰而竭矣。

1938年四月十日，激進社會黨領袖之一的前總理達拉第組成了一個全由該黨分子為成員的內閣，惟其聲稱秉持加入「人民陣線」之初衷，一力忠於陣線聯盟之政策綱領，頗得左派之認同。四月十二日，眾議院以514：8票，參議院以290：0票通過達拉第任命案。翌日又授其人以布魯總理未曾得到參議院認可的整頓財政全權，但時局使新總理很快地右轉了。五月以後達拉第的財政改革方案陸續公告；諸如把直接稅與間接稅提高百分之八的稅額以增加政府稅收，降低大企業的利潤所得稅以獎勵投資，法郎繼續貶值以利出口等(註46)，這些措施實際已與「人民陣線」財經綱領背道而馳。

同年八月下旬，達拉第又宣佈為左派「人民陣線」所一向堅持的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可以靈活運用的方案，其意在取消此制，終於激起了共產黨及諸左翼黨人一致地強烈反應。在久未達成協商的情勢下，十一月上旬主政的激進社會黨正式宣告退出「人民陣線」。十一月底左派舉數百萬人的全國性罷工向政府施壓，達拉第頒戒嚴令鎮壓之，二者勢同水火，「人民陣線」終於分崩瓦解(註47)，第三共和在紛擾不斷的政情下也逐漸衰微了。

正當法國政局混沌之際，1938年三月十日總理勻當去職政府無人主其事之次日，希特勒進行了德奧合併，法國如若置身事外。實則，這次併吞事件在國際上

註 45. op, cit. *La Crise des années 30 (1929~1938)*, pp. 189~192.

註 46. Jean-Pierre Azema, *De Munich à la Libération 1938~1944*, Seuil, Paris, 1979, pp. 23~27.

註 47. *ibid*, pp. 28~29.

已醞釀多時，法國歷屆內閣均陷於財經內政危機，皆無暇它顧，加以英國政府的消極態度，益使事不可為。三月十四日新總理布魯雖欲就德奧合併，及英國對德意之姑息作出些許反應，而召見捷克大使表明法國決心維護捷克領土完整，不受德國侵犯之決心。然就閣員之一，時任陸軍部長的達拉第之說法：「即便如此能給予捷克的援助也著實不多」(註48)的情況下觀之，法國在外交上也是無什作為的了。

同年四月廿七日，新總理達拉第的英倫之行，在德意擴張的歐陸問題上，受到英國的冷淡回應。隨即於五月廿日發生的捷克蘇台德區德軍出兵危機。危機初期，達拉第鑒於法國自身之利益考慮和捷法互助條約的原則，亦曾有履約的打算，而在內部意見分歧又未得到英國的支援下，竟於九月與英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相偕至慕尼黑與德談判。九月卅日簽下了犧牲捷克的「慕尼黑協定」，英法均以爲得到了和平，其實未曾稍戢希特勒的野心而戰爭的陰影已逐步籠罩了整個歐陸矣(註49)。隔年夏末，法國自己也上了戰場，第三共和終於走進了歷史的回憶中。

結 語

遠在1875年元月的瓦隆提案(L'amendment Wallon)確立第三共和正式體制之際(註50)，卻同時也隱伏了滅亡共和國的因子。那些各自獨立，互不隸屬而又相對牽制的憲體，使國會兩院各行其是。共和國總統的居間調和力量也因麥克馬洪(Mac Mahon)氏，在1877年得參議院之助解散眾議院之舉失敗後，終第三共和之世再無強勢之總統出現(註51)。當初立法諸公雖言受制於保皇派與現實的裁量，然撫今追昔能無慨然乎。

註 48. op.cit,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P.332.

註 49. op.cit, De Mnuich a la Liberation 1938~1944, PP16-18.

註 50. 見拙著，法國第三共和體制確立之史的研究，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廿三期，台北，民國八十年，頁10。

註 51. 同前，頁11。

再觀其時，共和初立風雨飄搖，共和黨人共體時艱多能同心戮力於共和目標之追尋，迄1879年共和派初掌國政而內部紛爭已起。始有黨內機會、激進之對立，進有共和派社會黨人之現蹤，一次戰後終而有左右派對立的水火之勢，共和黨人治國理念以時空流轉而著生流派，終致趨於兩端與夫大革命以降，共和之源緒又亦遠矣。時值30年代經濟困境、外交挫敗，法西斯黨人之衝擊，內憂外患，曩日可得而忍讓之憲體缺憾今而頓成鬥爭之標的，昔時可得以捐棄成見一力抗外之黨眾，今又以理念之異視同寇讎，謀權益切而原則盡失矣，其尙能苟延殘喘者，時局也，然戰火初燃第三共和隨即灰飛煙滅了。

若析言30年代法國政情，乃共和興建以來意識形態與制度爭持之極致實亦中的，其政事、其體驗本文之論已明，深意者其體現一近代民主國家政黨政治認知流程之總結，當可為不朽。